

● 刘梦溪著 ●

紅

聖

文化艺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伯陶

## 红 学

刘梦溪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60,000

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7-5039-0576-X/J·178

定价: 4.80元

## 题 记

我很欣赏美国的李田意教授说的一句话：“剪不断，理还乱，是红学。”自本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相继发表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和著作，开创红学的小说批评、红学索隐、红学考证三大学派以来，红学闹闹嚷嚷，造劫历世，已近百载，就中各种公案、许多委曲、诸般葛藤，实在是欲理无绪，难以尽书。《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红楼梦》是个谜，红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谜——东方学术之谜。

本书的目的，是想通过较全面地考察红学各派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对红学之所以为红学的原由从学理上给予说明。红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论著，自不能不有所论列和评价，但主旨在于阐述他们的红学观念，比较各自不同或相同的研究方法，着眼点侧重于描述红学这门学科的整体面貌和红学研究的方法论的思考，而不是去尝试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红楼梦》研究中聚讼纷纭的公案。正是此一特定的学术视角，使得本书兼有红学理论和红学史双重特点，也许算作红学史论更为确切。

如果不熟悉红学又对红学感兴趣的读者，能够透过本书窥到已成为当代显学的红学的一个大致轮廓，笔者的私心便会感到极大满足。

1988年9月9日于京华无梦斋

## 目 次

题 记 .....	1
第一章 《红楼梦》与红学 .....	1
第二章 红学与曹学 .....	40
第三章 考证派红学的危机与生机 .....	74
第四章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 .....	107
第五章 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崛起与发展 .....	178
第六章 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 .....	242
第七章 拥挤的红学世界 .....	267
跋 语 .....	343

# 第一章 《红楼梦》与红学

## 当代显学

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一门学问，像《红楼梦》研究这样，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学术发展过程，大故迭起，雨雨风风，《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因林黛玉焚稿断情而疯癫，埋怨母亲“奈何烧杀我宝玉”<sup>①</sup>，固是辗转流传下来的文坛佚话，未必尽真；现在深研红学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或者突然宣布自己于红学有重大发现的“红迷”，却代不乏人。甲骨学和敦煌学，在世界上有东方显学之目，如果说红学已成为当代显学，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

<sup>①</sup> 见于邹弢的《三借庐笔谈》卷四：“小说之误”，光绪七年刊本。

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现在有三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由红学家王朝闻、冯其庸、李希凡任主编，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还有贵州省红学会不定期出版的《红学》，在国内亦有一定影响。这三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团结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说到这里，我们还须提到，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赵冈、周策纵、柳存仁、方豪、陈庆洁、李治华等许多红学专家为之撰稿，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章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的超越性早已越过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晚清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sup>①</sup>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

---

① 参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5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又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即使曹雪芹在世，他也会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红学热感到惊异。何况《红楼梦》作者并不认为自己会有好的命运，书里面随时流露出一种前途无望而又无可如何的消极情绪。第一回写英莲出场，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对甄士隐说：“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脂砚斋在这句话上面加了一条眉批：“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衩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脂砚斋对曹雪芹的心境是洞察入微的，他知道《红楼梦》的写作有所寄托。这里直接写的是英莲，实际上包括作者的经历在内。所以曹雪芹地下有知，断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会享此殊荣，以至于还有什么红学“造劫历世”，闹闹嚷嚷，不可终日。

曹雪芹原希望他写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sup>①</sup>。谁知“把玩”的结果，竟冒出一个红学来。如果说开始的时候，红学这个词带有一定的玩笑性质，现在已大不相同。据说清末有一个叫朱昌鼎的文士，笃嗜《红楼梦》，而当时的风气是讲经学，人家问他“治何经”，他说：“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问的人不理解，他解释道：“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这是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的记载<sup>②</sup>。李放在《八旗画录》中也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sup>③</sup>

① 参见《红楼梦》第一回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

② 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1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26页。

可见红学一词，开始是有一定的戏谑和玩笑意味的。徐兆玮作的《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是蜗庐考索多”，则又为红学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材料。他在诗的小注中说：“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sup>①</sup>当然这是旧话，可以押下不表，且说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红楼梦》研究的日益发展，红学已经名逐实遂，现在可以说完全获得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真实内容。

对一部作品的研究成为一门专学，世界上并不多见。如果一定找例证的话，只有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可与之相匹配。英国有莎氏学，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刊<sup>②</sup>，每年要开规模很大的莎学讨论会。和《红楼梦》研究一样，莎士比亚研究现在也是公案迭出，漫无头绪，甚至著作权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至今有人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莎士比亚其人，如同曹雪芹的著作权不断遇到诘难一样。而且无独有偶，莎士比亚笔下的剧中人物也有四百多个，与《红楼梦》里的人物相仿佛，只不过莎翁笔下的人物分散在三十七个剧本中，《红楼梦》一部作品里就有四百多个<sup>③</sup>。莎士比亚研究是世界性的学问，《红楼梦》研究也在变成世界性的

① 《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 英国剑桥学者 Kenneth Muir 主编的《莎士比亚研究年刊》，1948年创刊，至1981年共出版34辑，每辑有一个单独的研究主题。参见裘克安的《莎学在英国》一文，载《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至345页。

③ 《红楼梦》到底写了多少人物，各家说法不一。诸联在《红楼梦评》中写道：“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三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参见《红楼梦卷》第119页）蛟川夫某山民加评本的明斋主人总评，说法同诸联，但上面有姜季南的批语：“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统计为：男二百八十二人，女二百三十七人，共得



学问。对这种状况，有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提出《红楼梦》研究可以成为专学，研究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能？比如说，为什么不可以有“水滸学”、“三国学”、“西游学”、“金瓶梅学”或“聊斋学”？其实，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能不能名实相符的问题。“水滸学”、“三国学”人们已在叫了，但能否叫得开，最终能不能获得一门学科应有的内容，叫开了，在学科建设上有无科学依据，仍是未知数。应承认，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中国从前有“选学”的说法，那是由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后世影响太大了，唐以后经常把《文选》与儒家经典并列，文士手中必备此书，恰同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sup>④</sup>。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偃坐偃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宋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sup>⑤</sup>

钱钟书先生对一书以名学的剖解，完全出自严谨的学术立场，可谓

---

五百十九人。吴新雷的《曹雪芹》则主张：“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六百二十多个”（江苏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又香港中文大学潘铭燊所编《红楼梦索引》（龙门书店1983年5月初版），用电脑统计，全书一百二十回，共得人物493人；何锦阶、邢颂恩编写的《百二十回红楼梦人名索引》（香港集贤社1984年版）则认为：“本事人物实得720名，其中男421名，女294名。”谨录以备考。

④ 汪堃：《寄蜗残赘》云：“《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81页。

⑤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40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不刊之论，启示我们治学之道，唯在慎思明辨，而不能逐无实之名，动辄以专学自诩。”

## 一书以名学的缘由

那末，究竟是何种缘由使得《红楼梦》研究能够一书以名学呢？

我认为首要的一点，还是《红楼梦》这部作品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红楼梦》不是一般的著作，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作者经历了一番特殊的经历之后，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她的问世，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总结，标志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她与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不同，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带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概括言之，可以说《红楼梦》具有反映时代的深刻性、思想内容的丰富性、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曹雪芹熟悉历史，痛切感到清朝的现实政治的腐败，看到他所属的阶级已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因此对贾氏家族种种弊病和子弟们恶德败行的描写不遗余力。书中充满了悲哀感和末世的气氛，越到后来这种气氛越突出，直到贾家及其亲族彻底败亡，“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贾府这样的封建世家，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清王朝颇具代表性，实际上这些大家族构成了封建宗法社会的一个个支柱，它们的败亡预示着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尽管作者主观思想并不一定很明确，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悲观、绝望、无可奈何，意识到矛盾，却无法解决矛盾，否定了旧的，又不知道新的是什么。太虚幻境室内写着“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的对联，《红楼梦曲》所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就是曹雪芹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的写照。所以《红楼梦》成为古今一大悲剧绝

非偶然，既是作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作品里透露出来的情绪和气氛，包含着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情绪和气氛。另一方面，书中又蕴含着理想的成份，包括美学理想、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渴望有一个合乎人性发展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实中没有这样的环境，就虚拟一个，这就是大观园。作者越是渲染大观园生活的明朗、欢愉、充满生机，越显示出现实生活的晦暗、沉滞、没有前途。许多章节，出发点原是想写喜剧，结果呈现出来的却是悲剧。这种情状恰好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为中国古典文学作了一个总结，也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作了一个总结。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举凡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包括各种制度，如土地制度、商业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嫡庶制度等，书中都有所涉及。而思想领域的东西，涉及的更加广泛，几乎包容了封建社会的全部思想体系。曹雪芹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对封建正统主义思想持决绝的批判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佛、道、老庄思想，书中也多有描绘，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性。《红楼梦》里出现的僧、道、尼姑不少，大都被作者写成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可见曹雪芹对世俗宗教不怀什么好感。但对宗教哲学，特别是宋明以来广为流行的禅学，雪芹似乎兴味颇浓。第二十二回宝玉悟禅机可为一例。敦敏《赠芹圃》诗说的“寻诗人去留僧舍”，大约也是指探讨佛教哲学吧，未必说明雪芹笃信宗教。而大段大段地摘引《南华经》原文，从内篇的《人间世》到外篇的《胠箧》，到杂篇的《列御寇》<sup>①</sup>，引录之后又叫人

① 第二十二回写宝玉联想到《南华经》上“山木自寇”的句子，语出《庄子·内篇·人间世》，原文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剝之。”同回“巧者劳而智者优”句，语出《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二十一回引录的“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搯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搢斗折衡，而民不争；殒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一大段文字，语出《庄子·外篇·胠箧》。

物对景体味，足见曹雪芹对老庄思想的重视。本来么，处于文网密布封建极权之下的有持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走自杀的道路，只有用老庄遁世无为的思想填充自己的灵魂。《红楼梦》中不肯苟活的人物的结局，主要是出家和自杀两途，此外就是口诵“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身心被各种矛盾迷眩缠陷得不可开交。这后一种，就主观世界来说，可以说获得了某种精神自由，联系现实世界，实际上仍是变相的苟活。当然作品的潮流，作者所执着追求和着力描写的，是带有反封建性质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这在主人公贾宝玉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他的人物包括一些被压迫的奴婢身上也时有表现。说《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有极大的丰富性，一点也不为过。

《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具有多样性。从文学语言的运用和创造来说，作品中叙事的语言、描写的语言、抒情的语言，包括对话、插话、独白、旁白、议论、回忆、插叙、倒叙、补叙，以及古语、成语、俗语、谚语、暗语、隐语、双关语、歇后语等等，应有尽有。《红楼梦》中隐语、暗语之多，有时令人难以索解。第一回叙宝、黛故事缘起，说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草，另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脂砚斋在句旁批道：“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又说“赤瑕”点红字、玉字。这些地方，作者用的就是隐语。还有多得不胜枚举的人名和地名的谐音，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谐“原应叹息”，贾府的清客詹光、单聘仁、卜固修谐沾光、善骗人、不顾羞；大荒山、无稽崖谐荒唐、无稽，十里街谐势利，仁清巷谐人情等等，脂评及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指出。这些地方无疑增加了读者的求索兴味。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更富特色，不仅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且有声音，有色彩，有音乐美，仿佛能够从人物身上和故事情节中独立出来，单独构成欣赏对象。凤姐之为，劣迹甚多，但她的语言，没有不称道的，连平素惧怕她的丫环们也喜欢

听她说笑话。同是运用俗语、歇后语，黛玉和凤姐迥然有别：一个细，一个粗；一个文，一个野；一个雅，一个俗。“癞狗扶不上墙的种子”、“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我是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这类语言，黛玉断说不出，宝钗也说不出。第四十三回宝钗评论凤姐和黛玉：“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惟有颦儿这促狭嘴，她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井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曹雪芹提炼文学语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凤姐的语言也是经过提炼的。至于刻划人物，则对比、烘托、铺垫、渲染、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反面描写、动态描写、静态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样样齐全。

论者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重视动态描写和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经常表现为薄弱环节。可是细详《红楼梦》，我们发现这部作品的心理刻划颇为独到。宝、黛爱情从前世宿因写起，至第三回一见如故，然后因宝钗的到来顿生不虞之隙，口角不断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两人的爱情渐趋成熟。这时，对黛玉的爱情心理有一段细致入微的描写：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又赶来，一定说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

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

这样细腻、连贯、深切的心理描写，作者要求读者同他一起停下来，共同探求人物的潜在意向，这种写法，我们在《红楼梦》以外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还不曾看到过。甚至说这种写法已带有心理分析性质，便是熟悉现代小说观念的西方读者也不会感到愕然。

下面再举一例。

第二十九回宝玉和黛玉发生口角，两个人闹情绪，没有去薛姨妈家看戏。贾母为此很着急，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这等于把宝、黛的特殊关系由贾母公之于众。紧接着第三十回，王熙凤亲自去劝解，没想到宝、黛正互赔不是，她拉了黛玉就走，当着众人说：“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又一次公布了宝、黛的特殊关系，使得满屋里都笑起来。此情此景，宝、黛二人极为尴尬。黛玉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则没话找话，和宝钗搭讪，结果又失口说宝钗像杨贵妃，一下子惹恼了宝钗，自己更加不好意思起来。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靛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

口笑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

这又是一段集中刻划人物心理的文字，但在写法上与前引例证不同，如果说前者带有心理分析性质，叙述者和人物合而为一，采取同时观察的方法，这里则是通过语言、举动、情态，扣住宝、黛、钗之间的微妙关系，来表现三个人各自的心理，叙述者站在人物之上，采取从后面观察的方法。<sup>①</sup> 宝玉、黛玉之间口角而又自行和好这件事反复在大庭广众中渲染，等于将他们的恋爱关系公之于众，在心理上宝玉和黛玉早已处于劣势。宝钗不必说话，就已经是胜利者了，何况她连续反攻。再加上凤姐打趣，宝、黛羞愧难当，无地

---

① 作品叙述者和作品人物的关系，是叙述学重点阐述的问题。法国的兹韦坦·托多罗夫认为有三种叙事形态，即从后面观察、同时观察、从外部观察。参阅法国兹韦坦·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一文，载《外国文学报导》，1984年第4期，朱毅译。

自容。作者用了“形景改变”四个字，可见对宝、黛的打击多么沉重。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作者写来似轻巧如常，笔底却有千钧之力。第五十四回贾母破陈腐旧套，痛贬才子佳人小说，曾使在场的宝玉、黛玉颇感尴尬，但这里所写是《红楼梦》中宝、黛最为难堪的一幕。不是说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完全没有心理描写，而是与《红楼梦》相比，总是略逊一筹或者几筹。现在人们喜欢讲诗化的小说，一些年青的小说作者对国外的此类作品刻意手摹心追；殊不知，《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上已开了小说诗化的先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品中的诗意的成份。即使用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诸种艺术特征，也绝不会一无所获<sup>①</sup>。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具有复杂性。曹雪芹生前没有最后整理完成这部作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续书的思想艺术远逊于雪芹原作。但后四十回究竟是谁人所续？原来认为是高鹗，后来产生怀疑，迄无定论。前八十回的待补之处也很多，如庚辰本第十七、十八两回未分开，第十七至十九回只有一个回目；第二十二回结尾处缺诗谜，畸笏叟注明：“此回未成而芹逝矣。”第六十四和六十七两回缺失。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方式也很不统一，显示出未经统一整理的痕迹。确如畸笏在甲戌本卷首的一条批语所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而且在《红楼梦》之前，曹雪芹写过一部《风月宝鉴》，不排除《红楼梦》中掺有《风月宝鉴》的文字，就像后四十回续书中可能杂有雪芹原稿一样。成书过程的种种复杂性，留下一个又一个未解之谜，给研究者带来困难，也增加了研究者的兴趣。红学之成为红学，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复

---

<sup>①</sup> 美国康乃尔大学 K. Wong 博士著有《红楼梦的叙述艺术》一书，黎登鑫译，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版，可参阅。



杂性有直接关系。

《红楼梦》不过是一部作品，就对象来说，是一个比较狭小的领域，但由于内容无限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能够以一书名学，归根结底还是由作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就是说，书里面必须有可以不断进行深入研究的素材、资料和问题，这是最主要的，舍此则其他理由便无以立足。

其次，考据学引入《红楼梦》研究，是使红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重要因由。考据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发源甚早，汉代就有了，唐、宋也没有中断，只不过达到成熟、发展为一种完善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并形成各种学术流派，是在清代的乾嘉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尠，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sup>①</sup>专门汉学直接承继明末清初的实学而来，但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的实学有很大不同。实学是与经世致用相联系的。汉学则主要是考据学，重实证，不空谈义理，是其主要特征。当时专门汉学有吴派和皖派，前者以吴县惠栋为代表，后者以安徽戴震为代表。惠、戴之外，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余萧客、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都是名重一时的考据大师，竞相著书立说，蔚为风气。钱大昕总结戴震的为学特点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sup>②</sup>阮元也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sup>③</sup>直接标出实事求是四字，可反映清儒的一般旨趣。戴震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经学有“三难”，即“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sup>④</sup>，如若获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惠先生栋传》。

③ 阮元：《掇经室集序》。

④ 《与是仲明论学书》（癸酉），《戴震集》第1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汤志钧校点。